

# 地方感引导下的社区治理路径探索\* ——基于日常生活的多尺度建构视角

Research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Guided by Sense of Place: Based on Multi-scale 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操小晋 周维楠 李雪伟 刘风豹 CAO Xiaojin, ZHOU Weinan, LI Xuewei, LIU Fengbao

**摘要** 地方感借由即时感知和长期社会建构影响人的时空行为,以地方感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可通过地方认同的形塑与作用推进社区营造,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现实意义。回溯日常生活的理论转向,结合地方感理论构建社区实践的分析框架,认为社区地方感在日常的具身实践中产生,同时人的行为流动逐渐跨越固有的社区边界,拓展为从身体到社区再至区域的多尺度地方意义的建构。其中,功能性的社区更新建立在对居民诉求及时回应和多主体协调治理的基础上,重塑人的中心性是对社会关系异化的战术抵抗。这可深化情感性的邻里关系联结,而象征性的地方文化则进一步将对外的社区印象转变为向内的生活自洽。地方感作为持续性社区治理的撬动关键,未来应在广泛的中小城市增加实证研究,以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Abstract** The sense of place influences human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through immediate perception and long-term soci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oriented by the sense of place can promote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place identity, which hold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ostering social harmony. Reflecting on the theoretical shift in everyday life and integrating the theory of sense of place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practi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sense of place in communities is generated through daily embodied practices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human behavioral mobility gradually transcends the inherent boundaries of communities, expanding into a multi-scalar construction of place meanings from the bod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to the region. Functional community renewal is based on timely responses to residents' demands and multi-stakeholder coordinated governance, reshaping human centrality as a tactical resistance to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can deepen emotional neighborhood connections. Symbolic local culture further transforms the external image of the community into internal life coherence. As a pivotal lever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sense of place should be empirically studied more extensivel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future to gradually achiev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关键词** 社区治理;地方感;地方意义;日常生活实践;多尺度建构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sense of place; place meaning;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multi-scalar construc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2-0075-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50210

## 作者简介

操小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

周维楠 (通信作者)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讲师,博士,793419231@qq.com

李雪伟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讲师,博士

刘风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讲师,博士

## 0 引言

从气候到土地利用的全球变化正逐渐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人类在流动的现代性下面临快速而多变的发展挑战,并在各地区采取不同的方式感知与应对<sup>[1]</sup>。其中,地方感已被证明是适应生态系统转变的关键要素,且在空间实践的行动机制中发挥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多维功能整合的社区体育空间生产研究:要素、机制与路径”(编号7230404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旅游绅士化效应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编号2024SJYB0160)资助。

作用<sup>[2]</sup>。地方感是人在心理、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建构的情感认知,该过程强调即时感知与长期社会建构的综合效应,而由此生成的场所意义是环境特征属性和个体属性的联合产物<sup>[3]</sup>。场所意义主要依靠经常性的环境行为和惯例维持,这些行为又在人们对场所的深度体验中得以维护和加强<sup>[4]</sup>。作为人类集聚和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地方感建立关乎可持续的社区营建,创造一种地方感已成为当代社区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社会资本形式塑造居民的个人身份和在地扎根感。

将地方感的建构纳入社区发展议题,旨在从人的情感视角出发开展具有培育社群意识功能的社区规划,为此如何在地方感理念下引导社区的治理实践是有待深究的话题。社区是承载日常生活并与其息息相关的场所,相应地,日常生活理论为其提供了创造诗意生活的思辨路径。对此,本文试图结合日常生活理论,通过地方感影响下的场所意义建构作本土阐释。同时,融入城市空间文化结构的观点,希冀立足我国社区文化逻辑共同解释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问题。社区空间文化结构强调在整体性的价值基础上,兼具公共性、在地性与日常性特征<sup>[5]</sup>,其中日常性体现在社区公共空间内居民的日常交往、休闲娱乐等功能性活动,具有平凡、重复和琐碎的特性。这与日常生活理论的概念内涵高度契合。在地性指因社区所处地域、气候和文化不同而存在的特殊空间要素,是居民形成地方认同的重要载体,与地方感密切相关。社区空间中的文化则是以一种隐秩序潜藏在社区的整体关系中,是社区生活在空间中的文化象征<sup>[6]</sup>。综合以上论述,本文拟从功能性、情感性和象征性三重维度探究超越单一尺度的社区空间实践,以期为新时期的社区规划和城市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 1 日常生活与地方感的实践互构

### 1.1 日常生活转向与地方概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忽视日常生活

在社会”转变的“现代性”到来,“日常生活”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场域之间或内部斗争、碰撞及融合的空间<sup>[7]</sup>,作为始终贯穿人类历史的“日常生活”概念开始得到学界关注,渐而产生日常生活的学术转向。其中,列斐伏尔<sup>[8]</sup>是日常生活转向思潮中发挥指引作用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从列斐伏尔开始,宏大结构的精英叙事被解构,开始将日常生活场景的“居民故事”视为问题域的源泉。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异化不断产生又不断被克服的存在论世界。这一观点的形成反映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的3卷本论著中,从异化的批判到革命的创造性实践,从个人主体性到社会性问题的扩展,列斐伏尔在从第1卷到第3卷的思索演进中不断拓宽理论视野(见图1)。现代消费主义下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各类难以被察觉的异化,造成的结果是人的自主性能力或自由度被无限压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出对该现象的直接批判,通过身体力行的日常空间实践,揭示异化实施主体的行动策略并发掘可能的反抗策略,以实现对其重新占有。因此,研究必须进入日常生活“实践”<sup>[9]</sup>,包括衣食住行、邻里交往、休闲娱乐等。这类实践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观察,构成以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过程分析进路,这对探析尊重居民日常活动需求下的社区营造及其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地方”概念主要形成了两大理论阵地,基于人文主义的现象学<sup>[10]</sup>和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建构取向<sup>[11]</sup>。事实上,这种“主—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讨论不利于对“地方”的全面综合认知。一方面,主体性视角下的地方研究有助于从人本身窥探空间意义的建构和人地关系的互动过程;另一方面,客体视角下的讨论更有利于地方形成机制的问题探究。个体行动和社会建构共同影响着“地方”的形成和发展,两者难以分离,行动者的决策无法脱离社会结构背景来谈,社会结构也需要行动者的实践形成<sup>[12]</sup>。因此,需要将个体实践与社会结构相结合,建立综合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整体观视角以探究地方的人地关系和建成机制。

对此, Agnew<sup>[13]</sup>提出地方由区位、场所和地方感3个方面构成,为“地方”的全面认知提供了分析路径。

### 1.2 日常生活与地方感互构

地方感通常是局部的,也是许多空间和时间尺度相互影响的产物。这些影响在一个地方相交,当交点汇聚于社区,地方感便指代为具象的社区感,包括对社区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满意度<sup>[14]</sup>。地方感的形成具有累积性,一般来说,个人因素中的年龄、文化程度、住房权属、居住时长,物质环境因素中的住房质量、卫生条件、生活便利性,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中的邻里关系、社区参与度、文化认同、治理水平等都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地方感<sup>[15]</sup>。无论是对物质环境的修复改善,还是社会环境的再生重塑,都不可忽视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使用偏好与关系互动建构。

日常生活与地方感呈现彼此反馈的互构态势,其间的桥梁是社区真实场景中的居民实践(见图2)。首先,居民实践反映了社区空间的功能有效度。这为阶段性的社区更新提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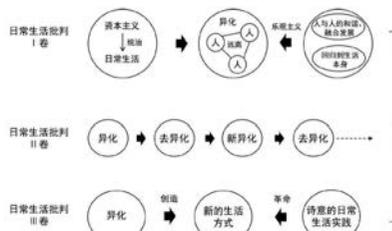


图1 《日常生活批判》3卷本的思想脉络  
Fig.1 Th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3 Volum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日常生活与地方感的社区实践互构  
Fig.2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sense of place in community practi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实施依据,并在其过程中通过动态地收集居民日常行为需求以创建符合在地特征的物质空间。其次,地方感非即时性的短暂感知,其长期积累的日特性要求在社区规划时考虑短期和长期的认识过程,通过满足不同体验的场所建设,使社区环境开始承载人的情感认知。最后,社区治理难以面面俱到,可能会导致不同群体间的潜在冲突,社区公共利益的调配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管理和完善,而日常生活实践的增多和地方感的强化亦在加深社区作为“家”的地方文化象征。

## 2 多尺度的社区地方意义建构

当空间被赋予了地方意义便成为了场所,社区场所意义的构成是多元的,缘于其作为“关系空间”呈现出的流动与空间的交织关系。其既体现在具身体验下的日常实践空间,还表现在空间的流动性逐渐打破一般行动边界的社区空间范围,由自我空间的延伸,拓展为从身体空间到社区空间再至区域空间的跨尺度空间关系和意义建构。

### 2.1 身体尺度

身体尺度的地方意义建构强调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日常实践,从微观的身体视角探究社区中居民日常生活的活动构成、情感变化和表征内容。从实践主体上看,中老年人和孩童是社区空间实践的主要群体,中老年人大都采取在社区步行道旁静坐闲聊的静态实践策略,或结伴在社区宅前空地等宽敞地带锻炼休闲;孩童主要在集中式的小广场和体育设施的布置处玩耍,构成家长照看、孩童相互嬉戏的社区场景,孩童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在邻里的关系建构和整体的氛围营造中发挥重要纽带作用。此外,年轻人的社区体验往往局限在来往过道的途经过程,尤其对短暂居住的流动群体而言缺乏驻足停留的环节,也就失去了强化社区地方感的可能。身体实践作为建构特定社会空间和社会文化事件的核心要素<sup>[16]</sup>,是地方感培育的基础单元,在社区治理中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反馈。

在情感空间上,身体是包括幸福、痛苦等各种情感建构的场所,隐喻着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因此,促进居民在社区环境的日常生活实践成为提升其地方感的有效路径之一。人的身体实践和互动被纳入社区资本范畴,既有研究多将社区资本划分为物质、人力和社会3大类<sup>[17]</sup>,在重视社区自然与建成环境,以及社区成员行动能力与相互关系时,常忽视人自身的空间实践,而这恰是人本理念建设的核心表征,也正是经由不同居民的身体实践和环境互动才使得社区富有活力。应意识到,人的身体能动性与其积极性本身作为一项重要的社区资本构成,是地方感生成的基础条件,亦是社区治理实践的起点。

### 2.2 社区尺度

与身体尺度不同,社区尺度的地方意义的建构将视角放置到整体,由住区内部向外拓展,通过公共活动空间的点线连接构成泛尺度的社区范围,其实质是将原本物质空间中单一化的人转变为具有场景化性质的人,由此引发的营造实践也转向主客体统一的设计本体论<sup>[18]</sup>。“场景”在城市学科的应用主要是以特里·克拉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此进行了理论延伸,为认识城市空间价值提供了整体性视角<sup>[19]</sup>。其提出,为了识别地方场景背后

隐含的文化与生活特征,不仅要关注环境设施要素,更要厘清场景中人、设施和环境的互动关系<sup>[20]</sup>。这点在社区场景中亦如是。社区的场景化指在社区实践中注重物质空间组合及其与人的行动轨迹的联合思考,相应的场景规划一方面将日常活化,保留和打造具有生机的社区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将动态的社区场景视作亟需延续的记忆场所,与物质要素一同纳入社区文化的象征系统。

社区场景对社会结构的强调也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意义的再构与社会关系的重塑紧密相关,对社区场景的分析可基于现场观察<sup>[21]</sup><sup>[73]</sup>(见图3),并围绕“空间—设施—人群—活动—时间”5个维度展开,而进一步社区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洞悉则要依靠扎根调研和深度访谈。在清楚社区环境要素和社会要素现况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社区培育工作便会事半功倍。目前,国内已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实施了多项由高校或社会团体组织的社区服务项目,从环境更新到活动举办的多重介入使得社区规划从技术指南走向公共议题<sup>[22]</sup>,在有效提升居民主人翁感的同时实现地方认同与社区共治的双向互馈。

### 2.3 区域尺度

区域尺度的地方意义建构是将单个社区



图3 基于现场观察的社区场景示意  
Fig.3 Community scenarios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1]73。

纳入由若干社区生活圈组成的区域系统,打破了就社区论社区的思维桎梏,也符合当前积极探索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要求。首先,从区域视角合理配置服务设施要素有助于提高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无论是供个人出行的消费性场所如菜场、商店,还是集体活动的聚集场所如公园、街角绿地等,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从社区内部及周边逐渐蔓延到更远距离的城市空间。其次,流动性下社区居民的构成愈加复杂化,面临外来迁移居民地方不适应、本地搬迁居民地方不认同等情感困境,跨越社区的城市公共空间为异质性居民提供了组织活动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区空间的意义,为外来移民提供了融入城市与新社区的渠道,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居民的社区再融入<sup>[23]</sup>。最后,居民的地方感知往往具有延展性<sup>[24]</sup>,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因素不局限于社区的环境要素,所处区域的条件供给也会直接或潜意识地影响居民的社区体验,反之,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亦会向上逐级演变为对区域乃至更大尺度的地方认同。

区域尺度将微观的日常生活行为涵盖其中,居民的地方感也从社区内部拓展到更大的城市系统,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组织体系、身份体系和社会边界。这也为社区生活圈规划及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见图4),而社区生活圈的范围也超越了固有的“15分钟”限定,反映了既有生活圈中心的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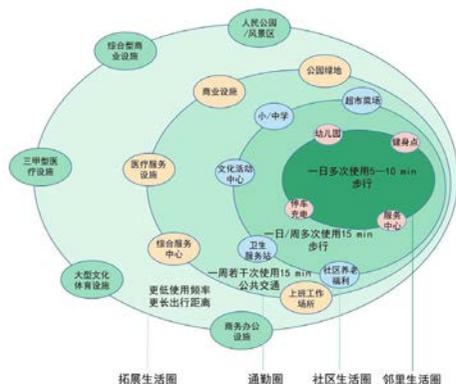


图4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构示意图

Fig.4 The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a "15-minut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性和生活圈边界的模糊性<sup>[25]</sup>,因而转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生活圈弹性划定。日常生活的区域性范围将居民的不同社会部分相联系,创造以社区为原点、日常性消费活动为基础、社会性公共活动为核心的地方实践模式,不同居民对个人、社区乃至区域的升尺度认同,一方面有助于消弭对立的地方感以推进地方融合,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区域本身的文化包容性、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 3 多尺度的地方感建构机制

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在实践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漫长生命的经验,不如说是同时联系着各个点并与自身交叉在一起的网络的体验,地方感便是经由相互联系的网络关系和空间使用而逐渐形塑的<sup>[26]</sup>。就个体而言,社区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居住体验、行为决策和归属意识。地域差异和人群素质常被认为是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sup>[27]</sup>。实际上这一观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规范,而将社区秩序失语的原因极大程度归于简单笼统的人的性质表述,不仅造成居住隔离下人的污名化,还陷入了看似难以介入和改变现况的境地。如果说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教育引导居民自身的意识转变,那么社区尺度的环境改造与完善则是从更显而易见的层面促进人的感知变化。一方面,社区整洁舒适的环境设施潜在规制了居民行为,出于对环境的爱心心理而减少不道德的社区破坏行为;另一方面,优质的社区环境也给居民带来家的感受,家的空间意义便从一方住宅拓展到社区范围,空间的力量彰显无遗。

居民的空间活动首先建立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因人群差异无论社区营造如何开展都难以实现全民参与,在保证较强功能的社区环境以使居民产生普遍地方感的前提下,针对性的社区建设将瞄准社区需求更为迫切的目标群体,如前所述,该群体以老人、孩童为主。安全便捷的社区内部空间为孩童提供了随时可至的游戏场所,孩童间自然的玩耍也促成了家长间的交谈,从互不相识的邻里关系转变为彼

此熟知的街坊邻居,具有情感意义的社区场景也成为空间记忆延续在孩童及家长的后续交往中。对老人而言,身体机能的下降迫使社区成为主要的活动场所,随着独居老人的增多,老人关怀成为牵涉社区维稳与和谐建设的重要议题。

身体尺度与社区尺度的地方感建构息息相关,日常生活实践促进了从个体的社区环境感知向社区的邻里关系塑造和地方认同的过渡。在此过程中,居民的日常活动不局限于社区内部,而是形成以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的活动范围。这也为从社区发展至区域的情感生成提供了可能。升尺度的情感融合依赖于基础设施服务的人性化,其背后逻辑是对居民诉求的及时回应,当居民的生活环境无法得到动态更新和补救,甚至出现职能部门互相推诿、居委会无可奈何和最终结果不了了之的情况,居民的地方感则会出现相反的降尺度分离,从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发展为对日益凋敝的社区环境的不满,地方感最后仅限于具有产权性质的住房(见图5)。因此,跨尺度的地方感建构是以人本理念下的社区空间营造为根本动力,以政府各职能部门、居委会的多方协调及其支持下的持续性社区更新治理为直接动力,以及以邻里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联结为间接动力。

由上可知,社区居民多尺度的地方感形塑始终离不开“关系”的建构,该关系是人一地空间关系、人一物设施关系与人一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应着物质、功能和情感3方面。3种关系的建构是面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异化所采取的策略性战术,在连接多尺度空间时以“链条”的形式发挥传导作用。社区居民的日常性异化一方面源于由地方政府主导与控制的空间供给,这在限制居民空间实践的同时使其转向其他替代品,最为明显的是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非人类物体。这是被现代消费和工具所异化的又一日常表现。当居民的空间实践减少和对工具化商品的依赖增大,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更难以产生交集,其结果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工具化”与“个体化”融

为一体,反映出人—人社会关系的异化。从这也能看出3层关系的建构并非割裂,它们的相互影响不仅体现彼此促进的因素累积过程,还突出了人—人社会关系建构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哪种关系的建构或异化形式,究其本质是“人的消失”,今天的异化塑造出的是一个巨大的个体<sup>[28]</sup>,渗透在社区的各个角落。这种主体性和个性正在不断通过社会关系的异化加剧空间的凋敝、地方性的衰弱、工具主义的盛行和多元治理的困境。因此,必须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这也印证并溯源了以往研究中对社区社会资本、邻里关系建构的重要性强调和理论假说。

#### 4 地方感引导下的社区治理思考

根据前文构建的日常生活与地方感互构关系的分析框架,结合身体、社区与区域尺度,从功能性、情感性和象征性3方面探讨地方感引导下内涵依次增强的社区治理逻辑(见图

6)。首先,功能性强调对居民在公共空间中日常生活行为的关注,与以往千人指标不同,根据社区的居民构成和需求差异制定因地制宜的设施类型与规模既是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也是促进社区精准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此外,不同地域的地方财政和社区服务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我国山区农业县城社区的配套设施一般较为简单,其中不乏无物业小区。对县城社区居民而言,他们的自我定位和要求普遍不高,环境的安全、整洁和有序即可作为功能性的体现衍生为对社区的地方认同。随着区域间差距的不断减小和居民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物业服务水平、业委会自治管理和居委会治理水平会提出更高要求,社区的功能性配置水平将趋于一致,其作为地方感的产生基础是社区规划可直接操作的。从这点看,功能性对应着如何以居民的身体实践为指引,在满足其物理(空间设施)环境需求的同时启发地方感的形塑,这是建立在人—物设施关系与具身

体验之上,由外部环境传导至内部感知的心理反应,身体成为社区治理中地方感营造的基本尺度和单元。

其次,情感性强调“家”的意识从居民住房蔓延到社区,该过程一是依赖时间的浸染,生命历程在同一地点的长期驻扎往往产生难以割舍的地方情感,这也就解释了老旧小区的原住居民常表现出比后来居民更深的地方认同,即便居民构成开始杂化,隐形的熟人社会在场仍得以延续。二是具有故事性和文化性特征的空间要素,无论是看似不起眼的一花一木,还是颇具年代感的建筑外立面等,在更新中应着重考虑居民意愿和改造方式,避免因处理不当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三是社区地方感的形成是持续而非断裂的,因此政府各职能部门、居委会、社会组织及居民间的联系沟通机制的建立必要且关键,将直接影响居民的地方感判断,可持续的治理路径则关系着社区要素的“内循环”能否实现。情感性建构将居民的地方感从一方住宅延伸到社区,社区尺度的地方感建立不仅依赖于身体尺度的地方感累积,还进一步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交往与社区多元主体协调的重要性,实质上是社区社会空间即人—人社会关系对地方感的形塑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前文对3类关系异化本质的阐述。

最后,象征性指代社区带给本地人及旁观者的印象感知,是具有评价意味的地方性感知,亦是在地社区文化的体现。社区形象已不仅是住区内部的空间映射,社区更新治理的扩散效应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尺度影响。一方面,老旧小区常被视为破败杂乱的,高档小区则被认为是舒适先进的,无形的潜意识易造成进一步的社会隔离,根据社区资源塑造地方感可减弱彼此区隔。其中既包括对历史环境的保留式更新,也希冀通过新邻里关系的搭建来弱化外界的刻板印象,转向内部的自治。另一方面,示范小区的打造带来了象征性的驱动力量,这是依托官方引导实现的社区治理和地方认同强化。该方式也易促成相关治理经验的总结学习和移植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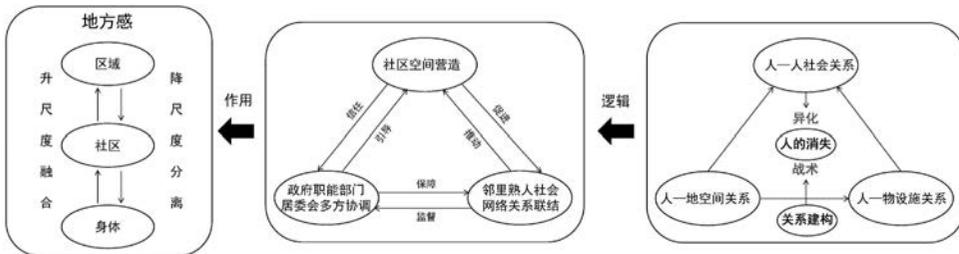


图5 多尺度的地方感建构机制示意  
Fig.5 The multi-scale mechanism of place-mak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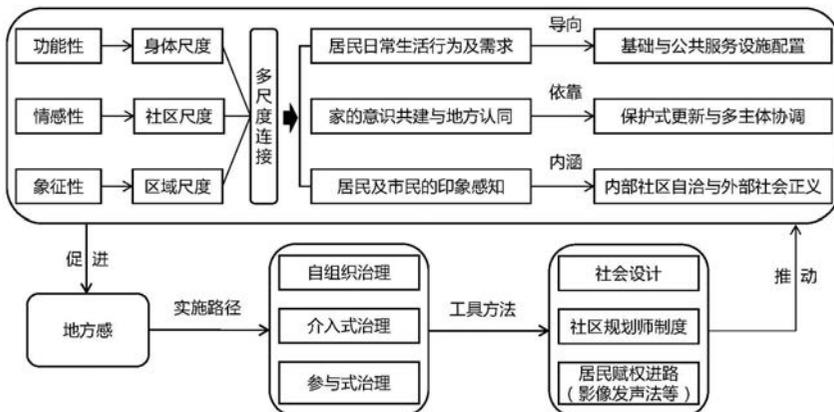


图6 地方感引导下的社区治理逻辑框架  
Fig.6 The logic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guided by sense of pl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强化居民地方自豪感的同时获得了外界关注与认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为社区新治理模式的尝试提供更多可能,基于居民地方感的社区治理实践亦在此过程中达到了多尺度链接与以人为中心的理想形态。

就实施路径而言,主要存在3种形式:①热心居民牵头、带动其他居民的自组织治理;②政府引导、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共同协助的介入式治理;③政府购买服务下第三方组织、社区规划师推动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无论是通过社会设计来促进社区共治<sup>[29]</sup>,还是应用影像发声法等参与性社区规划方法<sup>[30]</sup>,我国已有的社区实践多是在第3种形式下和一线城市中开展,多种社区活动的触发和明星社区的打造极大地增强了居民地方感<sup>[31]</sup>。但掣肘于多元治理理念与实际行动间匹配性的地域差,导致中小城市社区仅停留在建设初期的一次性规划,大多依靠居民的自组织以及居委会的协调治理,资金的匮乏和非持续的社区更新难以主动产生递进式的多尺度地方感。将社区的规划治理渗透到广大的中小城市,使更多居民从中受益并由此增强在地认同是增进社会福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实践与学术议题。由此可见,地方感引导下的社区治理是以情感治理为抓手,通过管理者、实施者与在地居民的共情及协同以深刻理解居民的空间诉求,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共同参与的行动路径,地方感作为一种思考维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社区治理体系。

## 5 结论与讨论

日常生活转向为从不起眼的平常经历发现隐藏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指引了思路,也为社区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兼具参考与解释力的视角。地方感向下扎根,依托于日常生活的时间浸染与社会交往,同时向上开花,“家”意识的地方扩散产生社区建设事半功倍的成效。社区地方感一方面在具身实践的日常生活中形塑,另一方面,人的行为流动逐渐跨越固有的社区边界,拓展为从身体到社区再至区域的升尺度地方意义建构。该过程依赖社区环境营

造、多元主体协调,以及邻里关系联结3方面的彼此反馈和共同驱动。当基本的居民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空间环境的日渐破败和管理者的互相推诿将导致相反的结果,造成居民地方感的降尺度分离,社区共建共治难以实现。地方感引导下的社区治理路径旨在从功能性的社区更新深化为情感性的社区共享,而象征性的社区文化则进一步将对外的社区印象转变为向内的生活自治,从而促进从社区到社会的地方认同与融合。从这一视角出发,社区认同可视为将个体成员嵌入某个特定的社会时空环境,并可成为社区成员身心安宁或精神秩序的锚固点,也就是用社区价值来抗衡社区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也是当代社会重拾社区价值的意义所在<sup>[32]</sup>。

相较于大都市丰富的社会资源,中小城市社区面临营造资金短缺、建设内容单一、居民意识薄弱、外来力量缺位等困境。在重视大城市社区实践的同时,亦需将其经验在地性地移植到更为广泛的中小城市社区,促使从居民个体到社区整体再到区域范围的地方感建立,这有助于由点及面地不断推动全国层面的社区发展与和谐稳定。鉴于此,实践者需要意识到日常环境中自我表达的作用,对个性化需求、控制感及个人空间给予更多关注,同时注重在地社区的文化发掘、延续和创新。这一目标的实现既要自上而下的资金保障与制度设计,也要自下而上的社区学习与多方参与。显然,地方感已成为撬动可持续社区治理的重要支点。■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WILBANKS T J. Putting "place" in a multiscale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ustainability scienc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5, 53(11): 70-79.

[2] MASTERSON V A, STEDMAN R C, ENQVIST J,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sense of place to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research: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Ecology & Society*, 2016, 22(1): 49.

[3] MASTERSON V A, ENQVIST J, STEDMAN R C, et al. Sense of plac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from theory to empirics[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9, 14(2): 555-564.

[4] RAYMOND C M, MARKETTA K, RICHARD S. Sense of place, fast and slow: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affordance theory to sense of plac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8): 1674.

[5] 黄瓴,陈欣,牟燕川. 社区空间文化结构城市社区更新规划的新理念[J]. *时代建筑*, 2021 (4): 42-49.

HUANG Ling, CHEN Xin, MOU Yanchuan.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community space: a new concept in urban community renewal planning[J]. *Time Architecture*, 2021(4): 42-49.

[6] 黄瓴,明钰童. 基于城市空间文化价值评价的山地城市社区微更新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8 (4): 1-7.

HUANG Ling, MING Yutong. Research on micro-regeneration of mountainous urban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ultural value evaluation of urban spac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4): 1-7.

[7] 张道建. “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 (9): 101-105.

ZHANG Daojian.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turn to everyday life"[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19(9): 101-105.

[8] 张一兵. 日常生活批判与日常生活革命——列菲伏尔与德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异同[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0 (5): 58-72.

ZHANG Yibing. Criticism of daily life and revolution of daily lif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enri Lefebvre and Guy Debord's critical theory of daily lif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2020(5): 58-72.

[9]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 (2): 177-199.

WU Fei. "Spatial practice" and poetic resistance: on Michel de Certeau's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9, 24(2): 177-199.

[10]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19-33.

[11] CRESSWELL T. *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2] 朗朗,林森. 结构化理论在“地方”研究中的应用——以北京三里屯的演变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6 (6): 1065-1080.

LANG Lang, LIN Sen. Place transform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anlitu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6): 1065-1080.
- [13] AGNEW J.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M].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 [14] 朱站, 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1): 1-8.  
ZHU Hong, LIU Bo. Concepts analysi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1(1): 1-8.
- [15] 朱志远, 赵星会, 梁春媚.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J]. 旅游导刊, 2021, 5(1): 23-42.  
YU Zhiyuan, ZHAO Xinghui, LIANG Chunmei.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ourism participation[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spects*, 2021, 5(1): 23-42.
- [16] 蔡少燕, 陶伟. 身体: 一个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 33(6): 13-20.  
CAI Shaoyan, TAO Wei. Bringing bodies into urban stud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olving urban problem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8, 33(6): 13-20.
- [17] 匡晓明, 李娜, 陆勇峰. 基于“资产为本”理论的老旧社区更新路径与实践[J]. 规划师, 2022, 38(3): 82-88.  
KUANG Xiaoming, LI Jue, LU Yongfeng. Old community renewal path and practice with "asset-based" concept[J]. *Planners*, 2022, 38(3): 82-88.
- [18] 言语, 徐磊青. 记忆空间活化的人本解读与实践——环境行为学与社会学视角[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8): 24-32.  
YAN Yu, XU Leiqing.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memory place revitaliz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behavior study and sociology[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6(8): 24-32.
- [19] 特里·N·克拉克, 李鹭. 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 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J]. 东岳论丛, 2017, 38(1): 16-24.  
CLARK T N, LI Lu. The concept and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from multinational studies[J]. *Dongyue Tribune*, 2017, 38(1): 16-24.
- [20] 黄翎, 王婷. 重庆渝中区山城步道品质提升规划: 基于场景理论的山地城市街巷更新研究[J]. 北京规划建设, 2021(1): 36-41.  
HUANG Ling, WANG Ting. The quality enhancement planning of Chongqing Yuzhong District's mountain city footpaths: a study on the renewal of mountain city alleys based on the scene theory[J].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21(1): 36-41.
- [21] 操小晋, 刘春卉, 余思奇. 老旧社区的具身实践与地方认同——基于超越表征的整合视角[J]. 人文地理, 2023, 38(2): 69-78.  
CAO Xiaojin, LIU Chunhui, YU Siqi. The embodied practice and place identity in old communitie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based on representation and non-represent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2): 69-78.
- [22] 郭紫薇.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J]. 城市规划, 2021, 45(1): 54-61.  
GUO Ziwei.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paths to community planning: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life" analysis paradigm[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 54-61.
- [23] 姚华松, 周春山, 黄耿志, 等. 空间的力量: 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J]. 地理研究, 2019, 38(5): 1136-1146.  
YAO Huasong, ZHOU Chunshan, HUANG Gengzhi, et al. The power of spac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 of square dancing and its effects of place ident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5): 1136-1146.
- [24] 钱俊希, 钱丽芸, 朱站. “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J]. 人文地理, 2011, 26(6): 40-44.  
QIAN Junxi, QIAN Liyun, ZHU Hong.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6): 40-44.
- [25] 黄怡. 社区与社区规划的空间维度[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2): 1-7.  
HUANG Yi. Spatial dimension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lanning[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2(2): 1-7.
- [26] 杨勇, 邹永广, 孙琦.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J]. 热带地理, 2022, 42(1): 29-42.  
YANG Yong, ZOU Yongguang, SUN Qi. The superposition of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identity of Qiaoxiang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Wulin, Jinjiang, Quanzhou[J].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 29-42.
- [27] 张志宏, 张璇. 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0): 125-128.  
ZHANG Zhihong, ZHANG Xuan. The participation will of agricultural relocation popul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aking Chengdu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10): 125-128.
- [28] 青年志. 项飙谈996和异化: 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 是意义贫困|专访[EB/OL]. (2021-02-03) [2022-11-03]. <https://mp.weixin.qq.com/s/I-Fbl6AYCZOXFSMcdky5gg.html>.
- China Youthology. XIANG Biao on 996 and alienation: the new urban poor are not economically poor but suffer from meaning poverty | interview[EB/OL]. (2021-02-03) [2022-11-03]. <https://mp.weixin.qq.com/s/I-Fbl6AYCZOXFSMcdky5gg.html>.
- [29] 周子书. 社区作为方法——用社会设计建构城乡融合协作平台[J]. 装饰, 2022, 347(3): 37-43.  
ZHOU Zishu. Community as a metho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th social design[J]. *Zhuangshi*, 2022, 347(3): 37-43.
- [30] 操小晋, 朱天可, 李雪伟, 等. 参与式社区规划何以增强? ——基于影像发声法的地方实践与经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4, 39(3): 118-125.  
CAO Xiaojin, ZHU Tianke, LI Xuewei, et al. How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can be enhanced? Loc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based on photovoice method[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4, 39(3): 118-125.
- [31] 唐燕. 我国城市更新制度建设的关键维度与策略解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1): 1-8.  
TANG Yan. Analysis on the key field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1): 1-8.
- [32] 黄怡. 社区和社区规划的潜在社会维度议题揭示[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5): 34-39.  
HUANG Yi. Revealing the potential social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4(5): 34-39.